

从伯尔尼到延安: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突破

[澳]罗兰·博尔¹ 黎敏² 宗元勇³译

(1. 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3. 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从1914—1916年间列宁在伯尔尼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到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革命认识论主线。列宁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了新的认识,为改变世界提供了主体和客体密不可分的独特见解。毛泽东尤其关注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他不仅掌握了其核心观点,还将其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在毛泽东看来,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区别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还成为反驳教条主义的论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的区别,并指出变化是绝对的,因为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也意味着旧的矛盾存在的条件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执政时期将出现新的矛盾。

【关键词】列宁;黑格尔;革命认识论;毛泽东;《矛盾论》;矛盾

【中图分类号】D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20)03-0035-09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 369}列宁在1902年提出的这一观点在1937年被毛泽东首次引用。^{[2] 336}如果说这一观点是列宁通过阅读马克思著作重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后提出的,那么毛泽东就是通过研读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接受了此观点。同时,毛泽东不仅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列宁的核心观点,还超越列宁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在下文中,我将简述列宁在1914到1915年间通过研究黑格尔而发展的革命认识论,并把重点放在毛泽东在延安的哲学研究(1935—1937),尤其是他对列宁思想的解读。我认为,毛泽东不仅

掌握了列宁的抽象概念、原理、主观干预和改变世界的观点,还超越了列宁。准确地说,他至少在两点上发展了列宁的观点:第一点是通过区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框架,从而能够将自己的立场与教条主义相对照,得出了尊重客观现实的结论;第二点是通过发展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之间的区别,重新定义了“绝对”(absolute)。就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绝对”指的是最终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一点成为毛泽东思想和指导1949年革命胜利的理论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简介】罗兰·博尔(Roland Boer),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黎敏,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宗元勇,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及2018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WWD004)。

【注】本文原载于Crisis & Critique(2017年第4卷第2期),经作者授权译成中文。

列宁在伯尔尼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3] 180}

我的研究从列宁在瑞士的伯尔尼开始。自1914年5月起，他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一直在那里被流放。1914年8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他激进的（革命）活动方式。第二国际中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国民议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这个决定实在出人意料。列宁最初认为这是则“假新闻”，因为他相信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达成一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参战，并在时机到来时，把枪口对准资本家。^{[4] 18}然而，德国的决定和随之而来的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等同“背叛”的效仿，给共产国际运动带来“奇耻大辱”。^{[5] 20}

在此关键时刻，有人以为列宁和他的支持者会开展激烈运动，发表言论并亲自站出来反对这一决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事实上，危机已经进一步渗透到共产国际运动的核心及革命方法。人们在思考：是该屈从于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寻求选举胜利，还是从根本上挑战这个反社会主义的框架本身？面对重重危机，列宁于1914年后期到1915年期间撤退到了伯尔尼的图书馆。在这段相对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列宁反思自己激进的革命经历，开始思考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及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对于列宁（和后来的毛泽东一样），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学习、反思和写作的契机。接踵而来的事件总让人难以招架，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一段意想不到的平静，一种对更伟大的认识和更严谨理论的需求——为彻底反思革命运动及总结必要的理论创造了时间和空间。

列宁转而研究谁了呢？他研读了有关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著作，从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读到拉萨尔，甚至拿破仑。这其中他对黑格尔尤

其感兴趣，特别是其伟大的作品——《逻辑学》。黑格尔确实是一个特别的选择。尽管列宁在其早期主张里推崇黑格尔和否定的辩证法（ruptural dialectics），^{[6] 163-174}但基本上，黑格尔是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忽视的。为回应那些曾试图把马克思描绘为理想主义者，或是具有黑格尔准神学本质的批评家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的有害影响中隔离开来。继普列汉诺夫之后，他们专注于强调进化论和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说，“1850年后，黑格尔在德国史无前例地被抛在一边”^{[7] 382}。当时，黑格尔哲学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正因如此，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一场与马克思相关的黑格尔思想的复兴。

主体和客体

这一发现（黑格尔思想对马克思研究的价值）意义深远。列宁陷入对主观性和客观性对立关系的重新思考，这或被称作一种革命的认识论。他发现，随着科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科学知识中的反思不再是一个不断接近外部世界的过程。科学语言依赖知识的进步，并不试图映射一个外部世界。相反，反思本身涉及如此多的外部和内部不可避免的关联，以至外部成为内部的、主观思考的一种特征。^{[3] 231}列宁认为，“主观性”不是指个人突发奇想，脱离现实，而是与客观现实必要地结合。

现在又一个特点进入（主体和客体的）均衡中：抽象。受到外部影响的主观思想需要一个更彻底的、作为实践和真理基础的、不断抽象化的过程：“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 171}抽象似乎需要一个从客观现实的藩篱走出的过程，但恰在此过程中，主观意识发觉不可能走出“外部的”世界。辩证地说，抽象化是主观充分意识到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外部世界的时刻。相反，具体化与外界

融合的过程需要这种抽象化。正如列宁所说,“概念(判断,推理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对世界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的认识”。因此,“(抽象)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了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3] 178-179}

革命实践

所有的理论研究都是为一个关键点做准备,即通过唯物主义实践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列宁认为,实践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过程,而是产生于抽象思维的辩证过程。这种实践正是当“概念变成了‘自在存在’的时刻。甚至还可以说,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试金石:‘人和人类的实践就是考验、衡量认知客观性的标准’”。^{[3] 211}因此,实践是理论反思的基础,反过来理论又指导了实践。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自必要的抽象过程的实践揭示了内在性和外在性的互相渗透。对于列宁来说,实践的核心特征是革命行动,是一种对世界的再创造。正如他所写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为什么?因为“世界不能满足人类,人类决定通过行动来改变世界。”^{[3] 212-213}因此革命实践不局限于夺取权力,还关注客观世界本身的改变。如果人类活动已经为自己构成了世界的客观图画,那么接下来就是“改变外部现实,消除其规定性”。这如何实现呢?通过革命者的自觉行为,消除已知的社会经济基础,并以新的方式再造。或者按黑格尔派的说法,这样的社会主义世界可以被视为像客观真实一样“自在自在的存在”。^{[3] 217-218}

我之前提过,这次(列宁)在伯尔尼对黑格尔的研究是一次对辩证法断裂维度的重要的再发现。它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深刻危机的回应(就像1905年初,对当年的革命回应一样)。换句话说,列宁正在努力思考这一危机,剖析导致各社会民主党派向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妥协的原因。对黑格尔思想的再研究使他明白,这些政党(甚至第二国际的重要成员)均陷

入一个误以为当时局势是不可避免的陷阱。他们不得不在这个框架内寻求变化,而不是试图改变框架本身。这被认为是列宁的反思洞察力,一种回顾过去,认识现在的能力。但是,这种反思在列宁作品中相对有限,远不及毛泽东对约十五年艰辛曲折的革命道路的更大规模的反思。

列宁对未来更感兴趣,尤其关心革命及其后果:俄国的落后使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性飞跃有了可能,^{[8] 307-311}“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作为推动全球革命、保护刚刚起步的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手段;一党制国家在保护工人需求和权利方面的作用;^{[9] 445-446}通过重新把自由和民主定义为公开的政党手段来解释个人通过集体得以壮大新的普遍概念。^{[10] 48}然而,其最重要的、前瞻性的见解涉及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在一些关键的文章中,列宁强烈指出:为了共产主义革命,1917年2月的革命——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和控制。列宁极力主张,革命者的主观意识可以用来改变这些客观条件,而非追随通往革命的客观之路,即所谓的,应该允许资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条件出现之前成熟(导致权力将被交给一个不情愿的资产阶级)。^{[11] 144-149}正如哈丁所说:“革命不是一颗李子,熟透了不用摇树就轻易落入手中。在列宁看来,革命更像是颗萝卜,在地里长大并成熟,但要使劲拔出才能收获,否则土里的微生物和寄生虫将一起作用,使它腐烂。”^{[12] 73}或者,用笔记中的哲学术语解释,共产主义对主观的革命者而言不是一个“外部的”阶段,因为革命者创造了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外部”现实与革命者的主观意识互相关联,不可分割。革命因此能够重新创造世界。相反地,上述革命者没有客观地理解外部的共产主义,却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行动,(他们)只是通过革命行动创造现实的一部分。^{[13] 476-480}

综上所述,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研究源于一次面临严峻危机时的必要撤退。为了理解危机,他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发现科学认知

源于对客观世界的必要抽象，就像认识自己的革命实践一样，由此，发现主观和客观因素紧密联系的真理。人不可避免地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世界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一样。但这也需要一个人即使受制于客观条件，也可以通过行动改变这些条件存在的基础——这就是革命的行动。通过研究黑格尔重新认识马克思，这完全是一种革命的认识论。毛泽东也将发展这样的认识论，但他是通过研究列宁，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理论。

毛泽东在延安

事物不断地从运动的第一种状态转变为第二种状态，矛盾斗争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通过第二种状态解决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矛盾的同—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14] 342

如果说列宁通过（学习马克思而）研究黑格尔，发展了革命的认识论，那么毛泽东的理论突破就源自解读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但这种解读有点独特，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让我回顾一下背景。毛泽东思想于1936年至1937年间奠定基础，并在1938年的延安新哲学社成立时确立。^[15] 197-214 这一思想的确立不完全是为了（像列宁一样）应对危机，而是响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在经历了长征的煎熬和国民党围追堵截后，时局明显扭转。长征是现代中国新历史的开篇，毛泽东在1935年的一首诗的第一行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另一个问题也随即出现：联合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北上延安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决策。长征之后，毛泽东已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即使不做政治领袖，也会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然而，他也受到莫斯科任命的反对派王明的质疑，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甚少。接下来的两年至关重要。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沉浸在理论研究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和原创观点。他们研究了什么？鉴于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中心。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当然是向苏联学习取经。^[16] 7-8 除了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他们还研究正统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希罗科夫（Shirikov）、艾森伯格（Aizenberg）、米丁（Mitin）等人的哲学著作。而此时，李达和艾思奇的第一批本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或正要出版。这些作品详细阐述苏联马克思研究的理论来源框架。即使没有详细探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思想，也可清楚看到，它们的关系是复杂而富有创造性的。

通过对列宁思想的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极有深度的见解。正如他在1965年所说：“我先研究列宁，然后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7] 145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我对《矛盾论》尤其感兴趣，虽然觉得《实践论》也可圈可点。“两论”均出自1937年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经修订分别以《实践论》和《矛盾论》选入《毛泽东选集》。在《讲授提纲》中的《矛盾论》讲稿部分，毛泽东11次引用列宁，在《毛选》的书稿中引用（增加到）13处。除了直接引用外，讲稿中参考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有15次（书稿中达20次），提到苏联16次（书稿中16次）和涉及斯大林1次（书稿中9次）。相比之下，他极少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虽然文中经常提及他们）。显然，列宁（的影响）很重要。但他的哪些作品重要呢？《矛盾论》中对列宁的引用大量来自他的《哲学笔记》（讲稿11处引用中有7处和书稿中的13处引用中有9处）。这些统计显示这一作品对于毛泽东来说格外重要，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什么背景下毛泽东如何解释它们。接下来，我将重点放在涉及革命认识论的三个话题：抽象与革命实践，唯物辩证法，同一性与斗争性。如果第一个话题是毛泽东研究列宁的理论突破，那么剩下的两个则是他对列宁的超越。

抽象与革命实践

简要地说，第一个话题将围绕毛泽东如何接

受列宁的观点展开。容我这样陈述：正如对《实践论》的片面解读可能产生的误解一样，有观点称：毛泽东是保守的经验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或盲目的客观主义者，因为他强调经验调查在从现象感知、认知到获取逻辑知识的质的飞跃中的关键作用。^{[14] 603-610}然而，对《实践论》认真研究及思考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来支撑其关键论点：“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 171}我们已经通过列宁认识到，抽象或理论化的过程需要与实际紧密联系，同时又是从实际中“脱离”的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一点，并重新界定了“反思”的意义。他这样做展现了他强调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飞跃的决心，这无异于要改变世界。^{[14] 610}正如他在《矛盾论》中所说，理论能使人获取“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分析现状是为了推测未来，从而完成革命任务。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可以担当“主要和决定性的角色”。对于革命理论的发展和提倡尤其如此，因为它提供了“指导路线，方法，计划或政策”。^{[14] 649-650}

唯物辩证法

到目前为止，毛泽东还是跟随列宁的脚步，但接下来的唯物辩证法则是他从列宁那里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在对矛盾的分析中，毛泽东区分了两种世界观。他们是理想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我们可以预料到，自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之后这种区别已经成为一个标准方法，并随后被运用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18] 353-398}事实上，毛泽东在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前部分所使用的正是这个方法。^{[14] 573-579}但这一特殊方法在《矛盾论》中没有被采纳。相反，毛泽东选择强调不同的区别，即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别。这种

对比将在毛泽东的手中变得极富成效，下面，让我先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

这一区别最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提出，随后被认为贯穿这部作品和他的《自然辩证法》。在《反杜林论》的其中几页，^{[19] 21-25}恩格斯重新定义了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范畴。对恩格斯来说，这种与自然科学（尤指17和18世纪时期）一起兴起的形而上学有三个主要特征：被测实体的孤立，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对立（也是因果对立），和他们的静止本质。相比之下，辩证法侧重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开始和结束，以及运动。“在对事物的思考中，它（形而上学）忘记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在考虑事物的存在时，忘记了存在的开始和结束；事物静止时，忘记了它们的运动”。^{[19] 23}恩格斯接着谈到，要辩证地强调“基本联系，相互关联，运动，起源和结束”的关系，据此构建他对自然和科学的分析。^{[19] 53}所以，我们研究现象的相互关联，它们的历史，并有集中分析运动而非静止的需要。此外，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这样三个命题：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20] 356}这两部作品影响力惊人。1878年《反杜林论》出版，并成为所有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必读之作。所以，不足为奇，恩格斯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出现在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21] 539-543}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出现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部分。^{[22] 106-109}它成为马克思主义标准表达的一部分。此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已出版（1925），因而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键命题的对比体现在：物质联系的普遍性，运动变化的永恒性，质量互变的规律性。

毛泽东在延安潜心学习阶段，以上立场大多是当时权威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关键著作也有中文译本（尽管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1938年才出版）。然而，重要的是，毛泽东没有引用那

些著作支撑自己的观点。相反，他引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什么？一种较常见的解释是，当时可以从苏联得到的材料大多关于列宁和对他的作品的诠释（特别是辩论），但这并不能解释他引用列宁的特定的作品的原因。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毛泽东的解释。在《矛盾论》中，他这样引用列宁：“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1）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2）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2] 312}列宁在此并未明确地提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然而毛泽东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列宁的，因为毛泽东对如何解释这一区别有特殊的兴趣。

列宁的《哲学笔记》让毛泽东意识到，形而上学意味着事物是孤立的、静止的或不变的。形而上学者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2] 312}，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或传统的中国社会（都是不变的）。这一点在恩格斯作品里也提到了。但现在，毛泽东基于列宁对黑格尔的再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对此观点的认识。对形而上学者们来说，（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来自外部，如气候、地理、入侵、殖民主义等。这些因素引起了规模和数量上的增加和减少。相反地，辩证法看到内部原因，如自我运动导致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变化的原因与矛盾的过程有关。即便如此，外部与内部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因为毛泽东已充分认识到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他指出，变化的外部力量源自于内部动力，外部力量又为内部变化提供环境，甚至借助内部动力而产生变化。

但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唯物辩证法发展观呢？我认为原因有二。首先，他正在为后人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找寻一种坚实的哲学观点。在这一点上，他写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

样地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2] 314}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有多样的、多层次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帮助，没有内在动力和特定地点的矛盾冲突，革命也不会发生。虽然，这个特定的表达没有出现在毛泽东最初的演讲中，但他当时正在发展这一立场，并（在之后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特点和中国特性的声明。

我认为，重读黑格尔，让列宁对主观与世界的联系及世界的变化的理解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这个论点变成论“自我运动”的重要性。如果运动的泉源被视为是外部的，它就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但如果关注“自我运动”及其内在源泉，它就是活生生的，因为只有这种观点才提供理解“飞跃”、“连续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显然，在这次对黑格尔的革命性的认识，使毛泽东把握了理解中国国情的方向。

毛泽东强调唯物辩证法的第二个原因涉及教条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论唯物辩证法”）演讲稿和文章的终稿之间有一个转变。在原稿中，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对苏联问题的辩论，包括对德波林派（实际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派）的尖锐批评。在终稿中，德波林依然被提及，但是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的标志而倍受关注。

换句话说，正如人们依据内部动力的观点所能料到的那样，这种转变是针对中国的内部斗争。这里没有必要细究苏联问题的辩论细节，因为我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对德波林派的评价：（他们认为，）矛盾须待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那变化的起因一定是外部的而不是内在的，那么德波林又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机械论”去了。在后期出版修改稿里，毛泽东加上了这个关键的联系，既然德波林派已经影响了中国共产

党，“就不能说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与该流派的方法无关”。最后，他明确指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根除教条主义思想。

我们有一条从德波林的形而上学到教条主义的线索，但毛泽东说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它采用“纯粹抽象的公式”，总是用“空洞无物的八股调”。更彻底地说是，教条主义者不明白情况变了，解决矛盾的方法也需要改变；“相反，他们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不仅会导致革命受挫，还会使一个本来好的局面变得一团糟”。^{[2] 321}毛泽东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得出一个足以和列宁对客观条件的表面假设的批判相媲美的结论。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允许资产阶级革命的成熟的假设与正确地采取辩证的和革命的方法背道而驰。相反，人们应该行动起来去改变各阶段运作的条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教条主义者和那些墨守成规、思维定型的“形而上学者们”一样，他们主张现状一成不变，可变的仅是数量，但绝非革命性的变化。如果不能理解情况变化的复杂性，即使矛盾之间和矛盾内部关系不断变化，也意味着人们停滞不前，革命陷入混乱。理论上的突破可能因循了毛泽东特有的思维方式，但结果和列宁在1914年重新发现断裂的辩证法类似。对毛泽东来说，矛盾的辩证法有助于“推测未来”，“解决矛盾”，“完成革命的任务”。

同一性、斗争性和革命性的变革

最后的理论突破需要跨出超越列宁的一步，而这正是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后做到的。在《矛盾论》的第五部分，我们发现原始讲稿和最终发表的书稿之间一些有趣的差别。在两个文本中，论证都从引用列宁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观点展开。有此关联，在某种情形下矛盾的一方将转化为与之对立的另一方。在这一点上，这两篇文章提供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实际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从一个到另一个的永久

性转变：生与死，高与低，幸与不幸，战争与和平，得与失。第二类起初看起来类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被统治者到统治者，反之亦然），农民和地主，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毛泽东不会主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或者说是农民与地主之间不断转化。他是如何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他认真地、反复地阐明这些转变只发生在“特定条件下”。起初，他的意思是，必须存在一些供变革发生的共同基础，但我提出另一个维度，也就是他对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斗争性的后续解释。

关于这个话题，毛泽东再次引用列宁的话，但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解释了这段话。列宁写道：“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23] 358}然而，他的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两个版本所包含的解释有些分歧。我发现，在讲话中，毛泽东在“绝对”的两个含义之间纠结。他倾向于认为“绝对”是无休止和永恒的。这种理解特别体现在他再次使用生与死的例子，提出有机体的生死状态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生与死的不并存是无条件和永恒的。但他在下一个例子，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有点纠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互相依赖、共存。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发展超出限度，就会出现裂痕或破裂，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文章中透露了一种条件开始转移的紧张局面。鉴于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状况。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和相对的，强调同一性和共存性。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因为“双方的斗争是持续的”，“为突然变化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毛泽东的生与死的例子中，这是永恒的，不断的斗争，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矛盾状态。在阶级斗争中，绝对性有所不同：“在一定条件下，两个阶级也互相转化，使剥削者转变

为被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成为剥削者，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什么类型的变化？是永恒的和不断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毛泽东就会面对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对立面的不断转变过程中失去效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会继续下去。然而，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时，他没有使用“不断的”“不停的”和“永恒的”等术语，反而用了“无条件的，绝对的，必然的”。

我认为这些字眼透露了他对“绝对”的理解的纠结。在待出版的书稿中，他最终通过生死与阶级斗争的例子澄清了意思，并对“相对”和“绝对”做了简洁的定义。他指出，静止是相对的，而显著的变化是绝对的。此外，相对静止涉及数量变化，而绝对关乎性质的改变。最终，相对静止的量变涉及联合或统一，而显著的、性质的变化导致统一的分解或破坏。

在这些改进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形而上学的观点中的定量和增量变化方面引起争论。但是由于形而上学者的方法是维持相对静止的现状，因而被卷入革命的辩证法中。第二，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实为黑格尔派）关于数量和质量之间辩证关系之论点的方法：“当事物处于第二种运动状态时，第一种状态中量的变化达到了最高点，引起了作为实体的事物的分解，随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最后出现显著的变化。”^{[2] 342}第三，他现在所说的绝对变化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绝对变化是显著的和定量的，但它也破坏了统一。什么统一？当前状况的统一，一种事态的既定坐标，准确地说，是那些为相对变化和数量变化创造了条件的静止状态。换句话说，革命的变化是最终的，彻底的。正如毛泽东所写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2] 342}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回头路，因为先前的统一和静止的条件已经永久破裂。事实上，这种情形下的矛盾在革命后实际上已经解决。矛

盾的解决意味着决定、处置和完成。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矛盾，实际上，人们应该料到会有矛盾，甚至矛盾还会加剧。正如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所发现的那样，它们将是新的，迄今没有出现过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转变成前一个矛盾的对立，因为旧矛盾统一所需的条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到目前为止，“绝对”的含义应该是清楚的，因为它表明什么是无条件的，最终的和彻底的。

结 论

我已经指出，毛泽东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关注是由于发现了其中的革命认识论。列宁对黑格尔的再发现意味着抽象作为通往更深入的具体之途径的关键作用和改变世界的主观干预角色。毛泽东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它。首先，他重读了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框架，还暗示教条主义者无法看到在特定条件下创造性干预的作用。第二点更为实际。准确地说，是通过列宁思想的解读，讨论了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相对同一性变成以统一为重点的量变，而矛盾的绝对变化则成为显著的、定性的、破坏性的和最终的。至关重要的是，通过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绝对的变化从永恒的转变为最终的和完整的。

这一理论突破对毛泽东的直接意义在于：能够理解1937年前革命道路的曲折（正如他在《矛盾论》中做的许多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理解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迫切需要——此前，两党敌对僵持已久。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延安发展的革命思想为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转变提供了灵活的模式，并为1949年革命胜利铺平道路。相形之下，教条主义者显得目光短浅。随着1949年的临近，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的形势下，毛泽东坚决拒绝斯大林提出的与国民党握手言和的建议。这一革命性的变化确实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与列宁不同，毛泽东在1949年

后,不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他还不断研究哲学,并实践了他在延安发展的革命思想。该思想同样适用于解决中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包括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许解决矛盾的一种绝对的方法是通过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时期矛盾会消失。一组全新的、意想不到的矛盾将会出现,一些是对抗性的,另一些不是——这在《矛盾论》的结尾已经预示到。

参考文献:

- [1] Lenin, V.I. 1902 [1961].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2] Mao Zedong. 1937a [1965]. 'On Contradiction' [M]. I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3] Lenin, V.I. 1914-1916a [1968]. 'Conspectus of Hegel's Book The Science of Logic'.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4] Lenin, V.I. 1914c [1965]. 'The Tasks of Revolutionary Social-Democracy in the European War'.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5] Lenin, V.I. 1914b [1965]. 'The European War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6] Lenin, V.I. 1894 [1960].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Democrats (A Reply to Articles in Russkoye Bogatstvo Opposing the Marxist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7] Bloch, Ernst. 1951 [1985].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In Ernst Bloch Werkausgabe, Vol. 8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 [8] Lenin, V.I. 1919 [1965].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9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9] Liebman, Marcel. 1973. Leninism Under Lenin [M]. London: Merlin.
- [10] Lenin, V.I. 1905b [1966]. 'Party Organis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1] Cliff, Tony. 2004.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Lenin 1914-1917 [M]. Chicago: Haymarket.
- [12] Harding, Neil. 2009.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M]. Chicago: Haymarket.
- [13] Lenin, V.I. 1923 [1966]. 'Our Revolution (Apropos of N. Sukhanov's Notes)' [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4] Mao Zedong. 1937c.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 In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6. Armonk: M. E. Sharpe.
- [15] Knight, Nick. 2005.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M]. Dordrecht: Springer.
- [16] Knight, Nick. 1990a. Mao Zedo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ritings on Philosophy [M]. Armonk: M. E. Sharpe.
- [17] Tian Chenshan. 2005. Chinese Dialectics: From Yijing to Marxism [M]. Lanham: Lexington.
- [18] Engels, Friedrich. 1886 [1990].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19] Engels, Friedrich. 1877-78 [1987].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20] Engels, Friedrich. 1873-82 [1987].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21] Plekhanov, Georgi. 1895 [197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Vol. 1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22] Stalin, I.V. 1938 [1939].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23] Lenin, V.I. 1914-1916b [1968]. 'On the Question of Dialectic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 [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责任编辑 曹祖明】

(下转至第85页)

On the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and Basic Features of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DI Chengguang

(Center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udies,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Anhui 230051)

Abstract: The two terms—“Party members’ democratic rights” and “Party members’ rights” are essentially of the same connotations and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some important Party documents. In terms of its exact connotations,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rt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Party affairs or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relevant Party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Party members enjoy eight rights, which can be properly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As far as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concerned, first of all,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are clearly stipulated and protected by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relevant Party regulations. Secondly,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are in consistence with their obligations. The democratic rights embrac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but Party members exercis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y rather than for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democratic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concept; implication; intraparty democracy

(上接第 43 页)

From Berne to Yan’ an: Th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Made by Lenin and Mao

Roland Boer (Translated by LI Min and ZONG Yuan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9)

Abstract: A distinct line of r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can be traced from Lenin’s engagement with Hegel in 1914–1916 to Mao’s arguments in *On Contradiction* in 1937. Lenin rediscovered Hegel’s dialectics through Marx’s works, and put forth the original proposition that “the subject is inextricably connected with the object”. Mao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Lenin’s notes on Hegel. He grasped the core ideas, developed and enriched it. He argue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not only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but also an argument against dogmatism. More significantly, Mao Zedong pointed 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elative identity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ir absolute struggle,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ange is absolute” because the world is contradictory, and contradiction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ngs. This also entails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old contradictions are outdate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will emerg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m.

Key Words: Lenin; Hegel; r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Mao Zedong; contradiction.